

改革“智囊”迟福林回山东老家话改革：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到来”



迟福林
做专题演讲。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本报济南10月12日讯(记者 刘红杰) 12日上午,南郊宾馆俱乐部座无虚席,齐鲁大讲坛第六次高端讲座在这里举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做了专题演讲并与现场听众互动。

迟福林演讲的主题是《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迟福林表示,两年前,他就在思考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对我们改革发展的大趋势需要作出什么样的判断?他的结论是:我国正处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

迟福林说,我们前30年的改革,历史性贡献就在于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推动中国从生存型的社会特征进入发展型的社会特征;而目前,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我们社会的突出矛盾。

对此,迟福林表示,“未

来五年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是打破行政壁垒,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关键五年;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五年;是实现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的关键五年。”

迟福林教授结合他自己长期以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深刻感悟,运用大量的数据、事例阐明了以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需要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这场讲座是今年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齐鲁晚报组织的齐鲁大讲坛第六场高端讲座,讲座恰逢2010年全国社科联工作会议在山东召开,参加全国社科联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社科联的领导和有关人士也参加了论坛,很多人还专程从外地赶来听取报告。

●观点集萃

我们的发展理念 应实现四个转变

本报记者 刘红杰

迟福林在讲座中称,未来五年“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也是第二次改革与转型的历史起点。这五年当中,从转型和改革的角度来看有三条主线,以经济发展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公共需求变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发展理念的共识

比体制的改变更重要

“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有许多障碍需要打破,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发展理念的共识,这对于我们形成统一的行动,对于推进公平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迟福林如是说。

迟福林认为,在发展理念上,首先要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理念转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增长,需要GDP,但是我们不需要GDP主义。GDP主义以GDP为目标,不顾整个环境,不顾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难以解决资源环境的问题,难以解决现在的社会矛盾,包括公共产品的问题,难以解决现在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不叫经济增长方式,而叫经济发展方式。”

第二个转变,则是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理念转变。“实行国富优先,是在生存型阶段国家正确的战略选择,但如果长期实行‘国富优先’,会使国家生产力快于民众消费能力增长,最后的结局是总量上去了,老百姓消费水平下来了。‘民富优先’则不仅能够实现发展的目标,同时可以释放扩大社会的总需求,提高社会的消费力。”

第三要实现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理念转变。迟福林认为,“‘做大蛋糕’是基础,但是在现实的发展方式下,不‘分好蛋糕’,就难以‘做大蛋糕’,即使做大了这个‘蛋糕’,恐怕也是难以消化的一个‘蛋糕’。”

最后,是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理念转变。“30年前国有资本的形成,主要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利润,今天国有资本是什么,主体是老百姓的税收。既然如此,国有资本应当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间做出平衡和选择,应更多地注意中长期问题以及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

争取未来五到十年
进入消费主导时代

迟福林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实际情况看,我们的消费率是逐渐走低的,现在基本上处在改革开放30年历史最低点。我们要形成以消费大国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形成消费主导为一个战略选择。”

中国在“十二五”时期,有没有可能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呢?迟福林对此持乐观态度。“我们去年人均GDP大概为3600美元,今年将超过4000美元。根据一般的发展规律,从现在开始的五到十年,正是中国消费主导确立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总体看‘十二五’时期,如果我们的最终消费率由2009年的49%提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由35%提到50%左右,那么就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消费主导的时代。”

(本版文字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稿件未经迟福林本人审阅)

迟福林与听众畅谈热点话题：

让农民拿土地换社保,不公平!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大讲坛开始一小时二十分钟,迟福林的讲座结束了,听众意犹未尽。由于他要赶飞机,只能有两位听众提问。第一位听众发问后,后面的听众开始“抢问”。第二位听众发问后,听众仍然激情洋溢,主持人只好又追加了一位提问听众。

大学生是否回农村,都应有制度安排

►迟福林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听众:现在大学生地位非常尴尬,一上大学就“被城市化”了,但没有人问过他们愿不愿意继续当农民。他们毕业后想当农民的时候,身份已经转不回去了,也就是说,非农业户口想转农业户口根本转不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找一个解决方法?

迟福林:有的大学生很想回农村,但也有人不想回去,不管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都应有一

个制度安排问题,想留在城里的有城里的制度安排,想回到农村的有农村的制度安排,我们现在需要在这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我想,在未来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大比例提高的前提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应该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关键是适应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大学教育结构、专业结构需要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

资本成为农村主体,将使中国面临灾难

听众:齐鲁晚报曾经做过一个报道,在股东的一个村庄里,已经没有50岁以下的农民,而且两年之内在当地也没有新生儿落户,请问,城市化如何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现在很多地方都实行“村改居”,让农民以土地换取福利的做法是否合理?

迟福林:城市化本来是为农民公平公正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口,但

是我们有些地方,一拿土地换身份,二拿土地换社保。还有,在农村不顾省情国情,过多地鼓励支持资本下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农民进城应是自愿的选择,而不是以进城的身分来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权益。第二,以身份来换社保,更是一个不公平的选择。本来社会保障是底线公平、制度公平,为什么

非要拿土地才能换得底线公平呢?比如说最低救济制度,这应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未来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水平上可以有差距,但是制度上应该统一。

城市化给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一些倾向。如果在农村过

经济领域要强势市场,公共领域要强势政府

听众:我来自四川,四川灾后重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强势政府。举国体制,使我们的灾后重建取得了伟大成绩。但刚才您提到,政府在经济领域不要起主导作用,这是不是相反的?

迟福林:不是相反的,而是相一致。灾后重建属于什么性质?它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公共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是企业,主导是市场,政府是服务,而在公共领域,政府的主体作用,主导作用尤其要强调,尤其要强化。

四川灾后重建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这是我们体制上的很大成就,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件事情绝对化,把政府的强势推到不当推的市场领域。我们既可以集中力量在公共领域做好事,也可能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这是有历史教

训的,所以重要的是政府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哪些地方你是主导,哪些地方你是服务。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在经济领域更多地发挥经济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公共社会领域更好地、更充分地加强和发挥政府的作用。